

■ 三言两拍

出现在北京地铁的首个反逼婚广告,希望能用“一平方米的面积”影响中国。“剩女”这类刻板印象是全世界女性都渴望摒弃的陈词滥调。看到米果设计的反逼婚广告,妈妈一手给她筹钱,一手戳着桌子,指责她大逆不道:“你做这种事情,小心被雷劈,过年时别让亲戚知道,会被骂死的!”

(4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反逼婚广告” 是两代人和解的契机

文/苑广阔

“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变成了“每逢佳节被逼婚”,而且逼婚的手段越来越多,逼婚的程度愈演愈烈,最终逼得一千未婚男女租男友或女友回家过年,也逼出了北京地铁如今这则备受关注的“反逼婚广告”。这则“反逼婚广告”是否真的能够实现用“一平方米的面积”影响中国的目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逼婚”与“反逼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却到了必须被认真讨论的时候。

有人觉得,“反逼婚广告”的出炉,意味着全国成千上万的“剩男剩女”们在父母家人的“逼婚”面前终于不再躲躲闪闪、王顾左右而言他,也终于不用再做出一脸羞愧状却只是为了让父母家人闭嘴。这么看上去,“反逼婚广告”不仅仅是一种宣言,更是一种宣战。可是,不管是逼婚的,还是被逼婚的,或者说不管是被逼婚的,还是反逼婚的,彼此之间可都是这个世界最亲近,也最关心对方的人,他们真的用得着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所以在我看来,“反逼婚广告”的出炉就像是一个终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的契机,可以促使我们坐下来好好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寻求一个和解之道,因为双方有实现和解的最基本条件,那就是彼

“反逼婚广告” 加剧亲情隔膜

文/张西流

每逢佳节被逼婚。一场“中国式逼婚”的多幕剧,在各地激情上演。为应对父母逼婚,一些单身男女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租友或办假结婚证回家过年,扮演假情侣、假夫妻骗过父母。显然,这是“病急乱投医”的极端方式,非但不能化解逼婚焦虑,反而踩了道德红线。至于一名女孩采取众筹的方式,在地铁登“反逼婚广告”,不仅难解逼婚困境,反而加剧了代际间的亲情隔膜。

剩男剩女,这个有些尴尬和自嘲的群体,正在不断扩大,并不可避免地在各大城市迅速蔓延,尤其在节日更受人关注。其实,婚恋原本是个很个人的问题,但随着“每逢佳节被逼婚”现象的日益严重,越来越成为一个带有共性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家庭和睦及社会安定,高素质人才“剩”多了,也造成许多企业人才的流失。这种状况和民工荒以及白领返乡潮的叠加,给沿海发达地区带来的影响,就不再只是剩男剩女的个人问题,而成为影响这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此之间的爱与亲情。

作为父母应该明白,时代真的不同了,先不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样的传统观念早就被年轻人抛到了九霄云外,而且和当今社会女性在经济、社会上的独立也严重脱节。与此同时,在寻找伴侣、面对婚姻的问题时,上一代人的“将就”理念也完全不再具有市场,不管剩男还是剩女,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是要结束单身,走进婚姻的,只不过他们不愿意为了“将就”就委屈自己,成全别人,所以他们的晚婚不过是在寻寻觅觅,而不是想把单身进行到底,父母完全可以淡定一些,宽容一些。

作为未婚男女,也不要吧“反逼婚广告”的挂出当做是自己的胜利,在爱与亲情面前,没有什么胜利与失败可言。对我们进行逼婚的,正是那些最牵挂我们、最惦念我们,也最爱我们的人,爱是逼婚最原始的出发点,尽管逼婚的过程让我们那么难以容忍,屡屡生出揭竿而起之心。“反逼婚广告”是否真的会让逼婚的父母少一些,我们不知道,但是在我们已经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之后,如果父母继续逼婚,我们是否能够多些理解,多些宽容,至少不要对逼婚的父母恶语相向,或者是以不给父母打电话,不回家来进行“非暴力不合作”?

然而,不管是租友回家过年,还是办假结婚证应付父母逼婚,亦或是在地铁登“反逼婚广告”,均是一种消极方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现实困境。一方面,单身男女应该理解父母的心情,主动与老人说出内心的想法,要耐心与家人沟通,采取欺骗手段,甚至过激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于父母来讲,要理解子女的选择,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干涉子女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父母逼婚也是一种家庭软暴力。

事实上,“每逢佳节被逼婚”现象,不仅仅是单身男女的尴尬,需要全社会采取积极措施去应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需要企业有敏锐的市场嗅觉,有人性化的企业文化,同样也需要为企业和人才市场提供服务的政府相关部门,有开放的心态,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在剩男剩女数目不断扩大的今天,化解逼婚困境,这应该也算是政府的一种责任和义务。要知道,年轻人少一点对“中国式逼婚”之类的焦虑,社会就多一份发展红利。

■ 社会观察

别让“租人软件”一步步走向“失足”

文/罗志华

在上海一家咖啡馆见到打扮时尚的李梦瑶(系化名)时,她看起来比照片略胖。近日,记者通过“闪电租人”App“租”了她一个小时陪喝咖啡。其实,28岁的李梦瑶还是一个职业卖淫者。一个月前她在一个“小妹妹”的介绍下知道了“租人”软件。她通过软件以每小时98元的价格出租自己,可以提供“吃饭、唱k、看电影、商务陪同”等服务,通过平台短暂接触后,李梦瑶会暗示自己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价格为2000元一天。

(4月27日《中国青年报》)

当前,“租人软件”已混杂进不少“失足女”,对此媒体已有不少报道。如今大概没有多少人仍会认为,这是一个与色情有着清晰界线的手机应用软件。然而,几年前当“租人软件”刚出现时,多数人并没有抱今天这样的印象。应该说,此种“互联

网+交友”模式最初出现时并不坏,只不过在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它却一步步地走向了“失足”。

“租人软件”最初的出现,与“春节”、“大龄青年”、“逼婚”等概念有关,年轻人工作和生活压力大,与长辈之间在婚恋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春节期间被长辈逼婚,其遭遇和心情总能得到社会的理解与同情,用于应对长辈的“租人软件”,也就带有了几分合理,认为它的出现是年轻人的无奈之举,即使它带有些道德瑕疵,也似乎可以理解,只要年轻人能够自己把握好分寸即可。

但春节过完,“租人软件”依然存在,逐步由春节专有,变成日常化,并由被动应付长辈,变成陌生人之间的主动互动。租一个人吃一餐饭、聊一会天、看一场电影、购一次物、参与一次聚会等,这些不仅看似无可厚非,而且显得较为前卫,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一个新兴

的职业,而多数人则认为,“被租”并不一定就错了,只要当事人能够自尊自爱,不做违法乱纪之事,常态化的“租人软件”也可以接受。

可并非所有使用这类软件的人都有道德自觉,都能遵纪守法,“租人软件”使用得当,能成为有益的交流工具;使用不当,则难免藏污纳垢,而一旦被不当使用多了,此软件就存在被标签化的可能,进而让正当使用也避而远之,这样一来,它可能成为色情服务的专享工具。

这是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每走一步,似乎都情有可愿,都无关紧要,但几步加起来,其发展就完全背离了初衷,假如当前不出手加以引导和管理,也许再无纠偏的可能。因此,当务之急,是厘清这类软件的性质,若仍认为它对社会有益,则应制订好相关规则,并将其纳入监管视野,不能再任由它继续向坏的方向发展。

■ 教育评弹

老师“蹭吃”,舆论何以悲情

文/邓海建

近期,有网友实名举报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大同初级中学老师们不交饭钱蹭吃初中生营养餐。4月26日,记者前往调查发现,该校老师蹭吃学生营养餐已有3年,汉滨区纪委介入调查后,责成学校追缴回老师的饭钱。

(4月27日《华商报》)

“蹭吃蹭喝”、“财政拨款”、“留守儿童”……当这些关键词纠缠在一起,确实很容易点燃公众的暴脾气。理论上说,尤其在戾气横流的匿名网络,监督类新闻往往更容易引发群体性“痛打落水狗”现象。可是,面对笃实的老师“蹭吃”事件,跟帖里却不见多少恶言恶语,甚至难得有多少义愤填膺,反倒氤氲着一种将心比心的悲情。

事情倒也不复杂:2013年4月,大同初级中学正式实施由财政拨款的学生营养餐工程,给在校学生每人补助一顿4元标准的午餐。据说学生营养餐开办后,大同初级中学老师就不掏钱而“蹭吃”学生的营养餐。校方的解释是:学校原来有教师食堂,自从开办学生营养餐后,教师食堂就被学生灶

占用了,每天中午学生吃饭,需要轮流指派十多位老师维持秩序。照看完学生就餐后,值班老师也就在学生灶吃午饭,考虑老师们吃的是剩饭菜,也就没有收饭钱。

情归情,理归理。既然4块钱的营养餐是财政送给孩子们的温暖,那么,教师跟着一起“蹭吃”,确实不太合适。再说,教师吃的究竟是不是“剩饭菜”,可能一时也很难说得清楚。好在事情曝光后,“老师的饭钱已经追缴到位,学校领导也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对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已开始整改”。有监督、有问责,结局也算皆大欢喜。

不过,不少网友似乎对这样的监督并不领情:比如,有人觉得“好歹说明饭菜的质量应该是没问题的”;又比如,有人认为“老师那么辛苦,给个午餐补贴不过分”;再比如还有人说,“我看过蜡笔小新,发现里面的老师是和小朋友一起吃免费午餐的”。

这些想法,固然有诡辩的成分在里面,固然不值一驳,但也是民意在校园餐问题上的应激反应:一是营养餐乱象不少。截至2016年2月底,全国共有29个省

份1360个县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校13.6万所、受益学生3352万人。但这5年来,各种克扣或质量悬疑也层出不穷。两害相权取其轻,吃得安全,也许是公众最底线的要求。二是教师餐问题常年无解,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学生尚且有营养餐,教师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蹭饭”固然不对,让老师吃饱吃好,也不算过分的要求。再者,2014年7月,一封批评某高校校长“就餐特权”的信件在网上疯传,有教师指责校长“吃饭也吃出阶级差别”。师生之间、教师与领导之间,在吃饭上分出三六九等的故事,令人倍感纠结。当这些背景交织在一起,师生同吃营养餐,似乎就有了某种诡异的“温情”色彩。

4块钱的营养餐,是孩子的就都留给孩子吧。就算真有剩余,总还有省钱的办法。一群老师在营养餐里“蹭吃”,确实有悖程序正义。但,弥漫在此事上的舆论悲情,未必是搞模糊思维,更多还是对当下教育生态的反思与拷问。听懂这份悲情,教育投入与改革或者会更有方向感。